

昨奉江电,敬悉官收难止,定拟给价二百元等,因与港局温道告白定价不符,未敢传布。究竟准给若干,尚祈示悉。^①

尽管粤港股东接受政府电股每股给一百八十元的收赎价对上海方面坚持二百元之价是一打击,但对于盛宣怀来说,这已经达到了他为商人利益竭尽全力的形象的效果,更关键的是盛宣怀绝不愿意看到官商交涉破裂,致收赎电股事半途搁浅。后来正是经盛宣怀晓以利害关系,上海股东亦接受了每股一百八十元的收赎价,使电报收赎归官圆满结束,股东们将得款转购汉冶萍公司股票,盛宣怀成为这项重大活动中的大赢家。

三、上摄政王书与招商局商办注册

1909年初,郑观应回顾了自己退出粤路公司后的生活经历:

官应返澳养疴,后赴沪就医,尚承粤商公举复为总商会协理,工艺院、保险公司董事,均已力辞不敢再为冯妇。去岁竟不到省,恐被各商纠缠也。^②

从中可知1908年初郑观应由沪返粤后,居于澳门,很少出席省、港两地的绅商界的活动。造成这种近于隐居状态的原因,除了有粤路风潮打击的影响外,郑观应身体不好也是实情,该

^①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七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郑观应不能完全配合盛宣怀的行动,还与此时他接请配合温灏的行动的邮传部的指令有关,见《电覆北京邮传部列宪》、《邮传部来江电》等,《郑观应集》(下),第1028~1030页。

^② 宣统元年正月十四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

年夏秋之交,他竟有“大病屡濒于危”的险情。久病不愈令郑观应十分消沉,他病中的诗句有:“故友频亡病屡危,杳中警报不容迟。速修更比龙眉切,稽首匡庐泪欲垂。”^①他此际已有生命不久的恐惧,于道教修炼的愿望更加迫切。

不过秋后郑观应的健康有所好转后,他着手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却是将“平生所蓄条陈、上书、论说、序跋稿本”编辑成书。^②据参与其事的潘飞声述:

余于戊申十月至澳门,寓侍鹤山房三月余,与山人日夕讨论时局,尽读丛稿十六册。乃采择要著编为八卷,名曰《盛世危言后编》,以别于前编。盖前编者言其所知也,后编者行其所言也。^③

① 《戊申夏秋大病屡濒于危感怀寄匡庐居士》,《郑观应集》(下),第1405页。该诗中“故友频亡”,首先当指王之春的去逝。王之春的去逝确切时间不详,但无疑在1908年中或稍前一些。《罗浮侍鹤山人诗草》(己酉本)收《挽王爵棠中丞》,《郑观应集》(下),第1402页。

② 《〈盛世危言后编〉潘序》,《郑观应集》(下),第7页。

③ 《〈盛世危言后编〉潘序》,《郑观应集》(下),第7页。潘飞声(1858~1934年),字兰史(郑观应称为潘兰史征君,或又名征君),广东番禺人。1883~1890年“受德国主聘至柏林讲经”。德国之行著有《西海纪行卷》、《天外归槎录》。(《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潘氏归国后郑观应有“公自欧西归来,游历京都”说,称其为“北京粹报总编辑”,后在香港主《实报》笔政。郑观应与其关系的最早记录在1898年前后,1903年后郑观应由于主要在粤活动,与潘飞声的关系趋于密切。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二人在立宪问题上有频繁的交流。相同的政治立场,使潘飞声成为郑观应晚年政治问题上最重要的对话者。关于二人的交往,见《潘兰史征君以四十书怀寄示次韵奉和》、《致香港〈实报〉总编辑潘兰史征君书》、《与潘兰史征君论时事感怀得五绝二十六首》、《与潘兰史征君论立宪书》等,《郑观应集》(下),第419、1382、583、1391、300页。

1908 年底郑观应除了初编成《盛世危言后编》外,还编定了《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己酉本)。着手这些工作固然表现出郑观应对生命不久的担忧,但这种情绪并不是他全部的考虑。《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己酉本)最后一篇是郑观应与潘飞声以画梅图为题的一组唱和诗,^① 潘飞声的诗为:

风骨棱棱老更新,空山独放不知春。
愈经霜雪身愈健,岂与凡花媚世人。

而郑观应的和诗为:

琼树经霜色更新,冷香入座四时春。
冰魂玉颊旧相识,我是当年踏雪人。

如果联系 1906 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来,郑观应作为中国最早议论议院政治问题的言论家被完全冷落于这项政治活动之外的现实,就可以理解郑观应与潘飞声这组唱和诗的真正意义了。^② 因此,郑观应 1908 年编《盛世危言后编》有为政治上被社会遗忘而进行抗争的积极意图。

除此之外,时局的变化也在不断地刺激着郑观应,使其焕发出活力。前述潘飞声所谓在澳门编书三月间“与山人日夕

^① 《潘兰史征君原作》、《题潘兰史征君画梅次韵》,《郑观应集》(下),第 1408 页。

^② 1906 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学部曾“奏辟头等咨议官八人,二等咨议官二十五人”,其中除有张謇、郑孝胥、汤寿潜、严复等当时的社会名流外,还有戊戌维新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汪康年、陈三立等。见《郑孝胥日记》,第 1061 页。

讨论时局”一语，并非夸张之言，因为 1908 年末正是中国政局又一次大震荡的开始。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年幼的宣统皇帝继位，醇亲王载沣摄政，袁世凯被逐离政回乡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都在刺激着郑观应。总之宣统元年初，当《盛世危言后编》已初编成之际，郑观应已经表现出在新的政治形势下跃跃欲试的心态，这一点可见此间他《怀王爵棠中丞并呈盛宫保》一诗：

宏羊怀抱匡时志，知我无如鲍叔牙。
诗史未能追李杜，著书欲学贾长沙。^①

郑观应从政局变动中看到盛宣怀的发展前景，寄希望于盛宣怀一如既往地给他以提携，如已故世的王之春待他那样。郑观应的这种心态在宣统元年初他致盛宣怀的几件信函中有更具体的展示。其一，宣统元年正月十四日，郑观应致函盛宣怀：

昨阅日报，知摄政王采纳群言，准各省臣民上书，凡由邮政局递到之函，无论何处来者一概不准拦阻，并不许擅拆等谕。务祈早日饬即缮发，免落人后，是为至禱。

承示现专心一意经营汉冶萍公司，已遵商律注册。窃念当此强权世界，不容公论，恐毁商之刽子手彼去而此来，亟盼从根底上做起，提纲挈领，开国会，

^① 《郑观应集》(下)，第 1401 页。

议院成，或可祝其不变也。^①

郑观应上摄政王书，应该就是收在《盛世危言后编》中的《上摄政王请速行立宪书》，^② 从中可以看到郑观应以“早开国会，颁布宪法，预建议院，饬举议员”的立场，积极地在预备立宪问题上的发表个人的见解，以期引起政府的注意。^③

其二，宣统元年二月间，郑观应致函盛宣怀：^④

……轮船局自袁官保奏归北洋大臣督办，不料袁官保离任，而继任者以招商局为北洋外府，调剂私人。……当此竞争之世，朝廷久欲振兴商务，上谕日言保商、兴商，而邮传部与北洋大臣仍然剥夺商权，动施压力，无异为丛驱爵，为渊驱鱼，殊深太息。官应赋性耿直，不合时宜，目睹时局不忍缄默，特此冒渎，尚祈鼎力维持。恤商兴国，惟公是赖也。^⑤

这是郑观应在向盛宣怀报告汉冶萍公司在粤及向南洋招股情况时，提出袁世凯隐退后的招商局问题。显然郑观应敏感到

① 《盛档》。

② 《郑观应集》(下)，第 286~288 页。

③ 郑观应尽管对张翼总办开平煤矿导致利权丧失于英国，深恶痛绝，但他对张翼的庇护人载沣出任摄政王却表现了热情。而《郑孝胥日记》则记此事：“摄政王年少，学识未定，所共处唯张燕谋(张翼)，诚为可虑。”《郑孝胥日记》，第 1171 页。

④ 《盛档》中的保留有同年闰二月初六盛宣怀回复此函之件，另见《盛宣怀未刊信稿》，第 160~161 页。

⑤ 《致盛杏荪官保书》，《郑观应集》(下)，第 871~872 页。

新的政治形势下,盛宣怀从袁世凯北洋集团手中夺回招商局控制权的时机已趋于成熟。

1909年初,尽管郑观应再度在政治领域以及企业活动领域都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不过二十世纪的政治大舞台,包括政治论坛已经不再给郑观应这样的洋务变法论出身的言论家留有发展的空间了。早在1903年左右《国民日报》发表的《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一文,关于郑观应的著述,有如下之评说:

盛世危言之世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误以传误,疑以传疑,群盲骚乱之秋,有执烛炬以炫耀者,是非郑官应之“盛世危言”乎?……惜乎徒供江湖派谈洋务之资助,八股家作策论之材料。^①

社会舆论的上述评论不但表明《盛世危言》式的言论已不再能有社会轰动效应了,^②而且意味着郑观应这样的洋务变法论者已不再受官方的重视。郑观应1909年上书摄政王后毫无下文,乃是自然的结果。

郑观应的社会影响力在企业活动领域虽亦与政治言论领域一样今非昔比,但却也还有一定的余地,尤其是在广东绅商社会中。这就决定盛宣怀于1909年夺回招商局控制权之际,还须对他有所倚赖。

至于盛宣怀,1908年秋冬之交他赴日就医长达两个月,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741~742页。

^② 郑观应将《盛世危言后编》编成后迟迟没有付印,包含着他也看到这样的基本事实,即印成后不可能有多大的社会影响。

在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去世后紧急回国。盛宣怀虽然看到新的政局为他提供的机遇,急欲对袁世凯报一箭之仇,但他对现实形势仍有清醒的认识。袁世凯虽隐退,已成气候的袁氏北洋集团却并未因此而根基动摇,欲一举恢复自己原有的权力,对盛宣怀而言也并非轻易之事。1908年间,盛宣怀积极通过为权要人物预留汉冶萍公司的“优先股”,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两级建立新的关系网络;^①袁世凯隐退后,他更主动地修复了与张之洞的关系,^②为与袁世凯北洋集团斗争作充分准备。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1909年1月)招商局第三十五届年度报告发布,这为盛宣怀向控制招商局的北洋集团发难提供了时机。前述郑观应向盛宣怀提招商局事即是这一背景。在有周密的安排后,盛宣怀于1909年3月致函郑观应,谓:

尊论招商局事,甚为确实。北洋专为剥削,总会办人多尚是糜费小处,今年结帐又亏本数十万,只得在自保船险项下拨补,邮传部又有收回之意,诚如来示,无异渊鱼丛爵。现在沪上股商准拟呈请注册改归商办,但恐粤商又有误会。……鄙见姑集股东数十人赴商部递呈,一面登报,必无不以为然者。港

^①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致陈筱帅(夔龙)再启》、八月初六日《致鄂督陈制台(夔龙)函》、八月初七日《致候选道宗再启》、八月初六日《致前宁绍台道喻》等等。《盛宣怀未刊信稿》,第129~134页。

^②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上张香相书》,《盛宣怀未刊信稿》,第144~145页。

多徐党,或愿放弃商权。即如电股,邮部本已允宽给票价,亦坏在港商立异,……吾兄为商务耆旧,既尚有心扶持大局,应请择同志同股(与其同股而非同志,不及同志而非同股者,因股分之有无,甚活动也)。愿列名公呈者,多则十余人,少则五六人,克日密寄敝处,以便凑集四五十人,即可办理。到京谒见商部,须有体面熟悉商务大员(辅佐者已有人)前往。弟意请公三月间来沪,以便偕弟北上,机不可失,务望速覆为盼。^①

接盛宣怀指令后,郑观应当即“囑广州、香港、澳门三处股友广告登诸日报,招股东挂号”。^②三月十五日(5月4日),郑观应作为已挂号的三千股粤港股东的代表离粤赴沪,^③参与招商局股东大会的筹备工作。同一天招商局奉旨归邮传部管辖,^④此后沪粤股东联名请准由轮船股商“就沪设立董事会”的电禀获邮传部同意。^⑤六月三十日(8月15日)招商局第一次股东大会在沪召开,选出以盛宣怀为主席的董事会,郑观

^① 宣统元年闰二月初六日《致郑陶斋函》,《盛宣怀未刊信稿》,第160~161页。

^② 《复上海招商局股东庄君得之拟集股东会议注册准归商办书》,《郑观应集》(下),第875页。

^③ 宣统元年三月初八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

^④ 在此之前,招商局注册商办首先受制于北洋,因而郑观应称:“如北洋大臣不准予注册,我众股东合当签名,公举代表赴部讨论,务须达其目的。”见《复上海招商局股东庄君得之拟集股东会议注册准归商办书》,《郑观应集》(下),第875页。

^⑤ 《邮传部复电》,《郑观应集》(下),第878页。

应、唐国泰、谭国忠等粤商均被选入董事会。^①

关于郑观应在此次盛宣怀夺回招商局控制权斗争中的作用,应有客观而全面的评价。郑观应自称:“官应等经手挂号之五千七百余股”,^②为盛宣怀争取了相当的粤籍支持者。1909年招商局在沪召开的第一次股东大会仍保持了过去局内江浙与粤港股东对抗的传统格局,盛宣怀在股东大会即将召开前对此就有估计:

……弟力劝股东只顾开会注册,他毋庸虑,逆料堂上决无冲突意见,不过粤党引庇其私人而已。所幸股东粤不及四分之一,开会举董,孤不敌众,虽一钟(钟文耀,原北洋所派招商局会办,招商局奉旨归邮传部管辖后,邮传部派为招商局正坐办——引者注)亦不致掣全局,惟会中总以三江股多为贵。^③

盛宣怀此处所谓“股东粤不及四分之一”,是将郑观应等名下“挂号之五千七百余股”排除在外的,而专指反对派的力量。

① 《本局编年纪事》,《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第61页。唐国泰,字翘卿,广东香山籍旅沪商人,上海茶业公所董事、谦慎安茶栈业主;谭国忠,字干臣,粤籍旅沪商人,在粤路风潮中支持郑观应。在此次郑观应为招商局股东挂号注册商办事活动中,始终得到潘飞声的帮助,潘与郑观应一样同为粤港股东赴上海会议代表。

② 《轮船招商局股东大会演说》,《郑观应集》(下),第884页。

③ 宣统元年六月初四日《致吴蔚若阁学函》,《盛宣怀未刊信稿》,第176页。

原招商局内股东江浙籍与粤籍有平分秋色之势,郑观应为盛宣怀争取到夺回招商局控制权所必须有的粤股的支持,如他在股东大会召开半月前告诉盛宣怀:

官应已得谭干臣(国忠)、唐翘卿(国泰)二公允出相助。官应幸替代有人,可以无虑。惟愿董事和衷共济耳。兹将唐翘卿来信附呈,藉慰垂注。^①

而谭干臣、唐翘卿正是招商局的粤籍大股东。郑观应为盛宣怀竭尽全力还不局限在这些方面。郑观应在以袁世凯北洋集团控制下招商局的衰败为盛宣怀商办招商局的主张争取股东支持者之际,自然遇到了徐润一派就盛宣怀督办招商局状况的反诘。徐润在招商局粤籍股东会上演说如下述:

力指盛办理前局之非,移动公款,接济铁厂、萍矿、通商银行、纱厂,毁本三十余万,以金利源作保礼和等等。以致局空如洗,此次如再照沪上十六会议(指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六日,即1907年2月28日)办理,则商局仍归盛手,必蹈先前覆辙,我港粤商股若不坚持到底,恐负北洋历年调护之本意,与夫唐景星观察创办之心血矣。^②

^① 宣统元年六月十四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此函表明郑观应入董事会争论颇大。

^② 《徐愚斋自叙年谱》,页一三二。

除此之外,反对派还尖锐地指出盛宣怀督办招商局“不将存项多买轮船、扩充航业,未曾会商股东而入股通商银行八十万,汉阳铁厂百余万,均于商律不合”。对此郑观应亦竭力为盛宣怀开脱,文过饰非谓仅是“其好博不专,为名所累软”。^①

正由于郑观应替盛宣怀效力的这些活动和言论,1909年之后郑观应在粤籍人士中落下“武进党”人的名号。这样的名声对于郑观应的社会影响是不利的,关于这点,我们从下述郑观应当选招商局董事后表示推却的言辞中多少可以感受到一些:

或讥弟近于好名,或疑弟有所希冀,皆不与辩,只竭其微力,冀尽义务,以图公益而已。弟之坚辞董事,欲清白乃心耳。^②

尽管如此,招商局股东大会的筹备及召开为郑观应的生活重又带来了生气。1909年在沪期间郑观应有十分活跃、广泛的社交活动,连郑孝胥也去拜访并宴请了他。^③极有可能郑观应在此间参加了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因为《郑档》中存有一“预备立宪公会收据”,上书:“今收到己酉年郑陶斋先生常年费计洋念肆元正。此据。宣统元年四月初四

^① 《复上海招商局股东庄君得之拟集股东会议注册准归商办书》,《郑观应集》(下),第875页。

^② 《致潘兰史、招安甫、叶舜琴、叶侣珊四君书》,《郑观应集》(下),第880页。

^③ 《郑孝胥日记》,第1195页。此间郑孝胥正在沪办日晖呢厂,欲请郑观应“筹广东销呢之策”。

日。经收柏文卿、会计胡二梅。”^①招商局股东大会之后，郑观应又受董事会委派赴京注册招商局商办。总之 1909 年间，郑观应已走出由于粤路风潮而导致的精神上的低谷。

四、1910 年参与招商局事务

1909 年 10 月下旬，郑观应肩负招商局商办注册之重任北上。盛宣怀将办理注册重任委以郑观应，应该说有借重郑观应与北洋系粤籍官员唐绍仪等人的关系打通邮传部关节的意义。郑观应的五弟郑翼之早在 1907 年就有通过唐绍仪为郑观应谋取粤港电报局总办职位的尝试。^②此次在津、京，郑观应出没于北洋官僚之中，从他此间给盛宣怀的信函中可知这种活动之一斑。其一，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9 年 11 月 9 日），郑观应致函盛宣怀：

今蒙徐尚书已允代港局温道之职，如无迁变，拟接办妥当，令小儿替代，借以仰事俯蓄，俾得脱累潜

^① 胡二梅亦为电报局大股东，见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二日盛宣怀《致邮传部公函》，《盛宣怀未刊信稿》，第 108～110 页。另据《郑孝胥日记》1908 年 1 月 5 日记：“至立宪公会，选举会计，开筒：刘厚生仍为会计员，胡二梅为查帐员。”《郑孝胥日记》，第 1122 页。另据《郑孝胥日记》记，宣统元年四月，正是郑观应与郑孝胥几度往来之时。

^②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郑翼之致郑观应函》（《郑档》）谓：“弟闻温公（温灏）告退出洋之说，电局正好入手，弟托友向唐侍郎力荐我兄。惟唐公云该局在广，权仍由督，嘱弟转达由广先通气玉帅，如玉帅有电或信来询，伊无不答应照行。”